

凭窗读史

孔子到底长什么样

9月28日,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日,人们在纪念孔子之时,恐怕也会好奇,孔子到底长什么样?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既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古圣贤,也是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人之一。

孔子的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的气质,还深刻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等儒家文化圈。

孔子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门槛上,孔子与古埃及的摩西、古希腊的梭伦的塑像并排站立。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宣言》,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这样一位现代人最熟悉的古人,我们对他的相貌如何,却知之甚少。翻开《论语》,我们可以看见孔子的笑——“莞尔而笑”,孔子的哭——“颜渊死,子哭之恸”,孔子的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的骂——“朽木不可雕也”,甚至孔子如何穿衣、吃饭、如何睡觉的细节都有,但是对孔子的相貌少有论述。



见老子(左一)。东平汉墓彩色壁画局部孔子(左二)

孔子是“反字”的“长人”吗

距离孔子两百多年的荀子说,孔子“面如蒙俱”。杨惊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说孔子的脸像驱鬼的神像。这是一个比喻,喻体和本体有不止一个相似之处,关键看取的是什么相似。一般理解为孔子的脸长得和驱鬼的面具一样,给人以凶神恶煞的感觉。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被后世看作信史。他距离孔子已有三四百年。当时经学兴起,带有迷信色彩的讖纬之学中就有关于孔子容貌的内容。比如《孔子反字》,是谓尼甫(一作尼邱)。

班固《白虎通·姓名》篇记载:“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故名为丘。”所谓“首上圩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圩顶,言顶上窟也”,窟通洼,凹低的意思。“圩顶”即指头顶凹陷。由于圩顶取象于尼丘山,所以被称作“尼丘”。

历代画家如何画孔子

塑造孔子形象,是历代艺术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传说历史上最早的孔子塑像是孔子弟子子贡在孔子去世后雕刻的孔子夫妇雕像。

西汉时,蜀郡太守文翁修学宫,作石室,刻孔子坐像供奉。东汉时,桓帝建庙,在壁上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汉代海昏侯墓漆器屏风,绘有孔子生平文字及孔子画像,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

今天我们如何画孔子

如何呈现孔子的相貌,是摆在历代画家面前的一个难题。头顶凹陷在画像中不好呈现,呈现出来也不好看,不能体现孔子的威严。所以这一点几乎在历代孔子画像中都难以看到。

此外,孔子弟子子思曾有“先君生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孔丛子》)这样的话。如果属实,那么孔子连眉毛和胡子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的孔子像,几乎都有浓密的须眉。如果在画像中呈现没有胡子的孔子,实在是违背古人心目中孔子高大的形象。

名曰丘云”,应该是受到当时民间传说的影响。在《孔子世家》中还有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一句。这似乎说明,孔子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得名于出生时头部的生理特征,二是得名于家乡的一座山名。如果孔子出生前,父母确实“祷于尼丘”,那么得名于尼丘山似乎顺理成章。反驳此说的人则考证古人“不以山川”命名的原则。

持前一说的学者,认为孔子得名于生理特征,征引了现代医学来解释,婴儿期如果患有腹泻等症,会引起婴儿前凶门凹陷,明显低于周围颅骨。学者推测孔子出生后患病,导致前凶门凹陷。孔子父亲叔梁纥在孔子出生时已经年过六旬。由于父亲年龄偏大,可能影响了孔子先天体质。学者引用晋成公名“黑臀”(“黑臀”当为胎记)来佐证孔子之命名。类似的还有郑庄公名“寤生”(“寤生”近似今天“逆产”)。

如果孔子的名字得自山名,那就和相貌无关。如果得自生理特征,则与相貌密切相关。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理。在没有更加过硬的证据之前,只能两存之。

再说孔子的身高。《孔子世家》说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根据战国、汉代出土实物,一尺

祠“孔子见老子”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孔子石刻形象。山东东平县“孔子见老子”汉墓彩色壁画,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孔子彩色壁画。

魏晋以后,孔子成为文人画家喜欢表现的人物。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东晋顾恺之、王廙、戴逵等,南朝陆探微、刘焯、张僧繇等都画过孔子。

唐代时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各地建孔庙,为孔子塑像。孔子画像和塑像大量出现。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都画过孔子。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有“双绝”之誉,盖孔子为“文圣”,吴道子为“画圣”,一图见两圣,

研究追求的是“真”,绘画追求的是“美”和“善”。归根结底,真善美是一体的。但还是各有侧重。通过学术研究来探求孔子的真实相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孔子,也有助于画家更好地呈现孔子。而画孔子像和雕塑孔子像,一方面是艺术创作,要追求“美”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价值观的宣扬,要追求“善”的效果。

因此,历史人物画创作,不是以物质材料来描绘人物,而是画家用心灵穿越时空的帷幕,与我们辉煌文明史中的不朽灵魂对话,以现代人的心智和情怀诠释历史和人物。那些我们在史籍上读过并想象过千百次,但始终朦朦胧胧的形象,被画师充满情感的画笔塑造出来,释耀于读者眼前,这是国家神思妙想的结晶。这是我研究孔子画像三

约合23.1厘米,这样孔子就有2.2米多高,和篮球健将姚明相当。这应该也和当时的缙绅之学有关。汉代《春秋纬》:“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昂。”这样看,司马迁还是比传说中少说了一点。孔子的身高在《论语》中同样找不到佐证。不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春秋时鲁国的一勇猛将,曾扛起重达一半的城门,故同伴出去,“曾扛起重达一半的城门,故同伴出去,“曾扛起重达一半的城门,故同伴出去。”

孔子也有类似父亲的功绩,《吕氏春秋·慎大》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关,指门闩,国门之关,指用一根巨大横木做成的门闩。孔子力气虽然不及他父亲,只身托举起城闩,但举国门之关的力气,也非常人可比。《淮南子·主术训》篇记载孔子有多项本领:“孔子之通,智过于管仲,勇服于孟贲,足履郊藜,力招城关。”“力招城关”,即“举国门之关”,可见孔子并不是一身书生气的大夫,而是豪杰。

在民间,相传孔子相貌有“七露”之说,即“耳露轮、眼露白、鼻露孔、口露齿”,这种说法最早见于金代孔元措所撰《孔氏祖庭广记》。民间流行的许多孔子像都具备上述特征。

是为双绝。这幅孔子像是迄今流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孔子“标准像”。

为孔子画像代不乏人。明代出现了按编年顺序反映孔子一生言行的连环画册。这些画册被称作“圣迹图”。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圣迹图”,应以明正德九年(1444年)张楷序刊的“圣迹图”木刻本为最早。清代改琦手绘的《孔子圣迹图卷》现存10幅,属名家真迹。

两幅明代佚名画家的《孔子燕居像》是流传较广的孔子像。

近代以来孔子画像更是数不胜数。任伯年、徐悲鸿、黄羲、戴敦邦、刘国辉、毕建勋、马振声、黄发榜、冯远、于安万、孔维克等名家都创作过相关画像。

十多年的心得。当代画家创作历史人物画,已有很多成功先例。如蒋兆和创作的张仲景、孙思邈、张衡、祖冲之、曹操、杜甫、李时珍;刘旦宅创作的秦始皇,李斛创作的关汉卿,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教科书上以他们创作的形象为这些历史人物的画像。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杰出人物,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宝藏。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艺术家可以创作,也应该创作出新的形神兼备的孔子形象。新的孔子形象应该既能体现历史上孔子的神韵,同时也能被现代广大读者所接受和认可。新的孔子形象既是赓续传统的,又是符合时代审美的。柯琦



二十世纪初的杭州西湖文澜阁。

陆费墀与《四库全书》

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汇编丛书,也是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集成之作。说起《四库全书》,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即担任全书总纂的纪昀。其实《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经了征书、编纂、誉校、装订等漫长的艰辛过程,凝聚着成百上千人的心血与智慧。出任全书总校、后来更因此而身死家毁的陆费墀(chí),就是其中之一。

赞修书自始预事

陆费墀(1731年-1790年),复姓陆费,名墀,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他自幼聪敏,涉猎广泛,不仅精读传统的经史诸子,而且堪舆、医卜、木数、方技等亦“靡不究晓”。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36岁的陆费墀喜中进士,随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参与内廷典籍编纂。

(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所上“修书”奏折引发。时任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曾以修书非急需“政要”,意欲阻挠。户部尚书于敏中则认为朱筠建议符合“文治天下之大计”,因而“固争执”。由此在朝堂间引发是否开馆“修书”的刘(统勋)、于(敏中)之辩,两者相持不下。

中,担任内廷编修的陆费墀就已参与其中,并起到独特作用。乾隆帝后来将陆费墀视为响应修书的核心人物,认为《四库全书》“发端于敏中,而承办于陆费墀”,又强调说:“陆费墀从而附和,是以于敏中奏充武英殿提调,令专办《四库全书》一切事宜,众人之进退,皆出其手。”

任总校肩挑重担

乾隆帝启动《四库全书》编纂,意在“用昭穆府大成,自秩唐宋而上”,因而期望甚高,对编纂也提出了极高要求。但《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体量巨大,修书所用底本又来源多样,版本歧异不一,传抄之误在所难免。为保证编纂质量,“四库馆”设立了分校、复校、总校、抽查等诸多流程。出任总校的陆费墀,遂成为统筹校核质量的关键人物。

早在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底本“必须折衷画一,应令武英殿提调、翰林陆费墀董司其成”。陆费墀由此承担起总校全书、“酌改字样”的重要任务。于敏中也多次强调校勘的重要性,写信反复叮嘱:“承办《全书》及《荟要》分校诸公,当请其到署,以此日致致之。各宜经意,勿留错误之迹,日后取咎。总祈慎之又慎为嘱,并与丹

叔言之。”于敏中所言丹叔,即时任总校陆费墀。所言的《荟要》,则是编纂过程中先行汇集精华的《四库全书荟要》。“四库馆”由此形成“全书处”与“荟要处”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修书组织。而两者的校核,都由陆费墀负责。

乾隆帝对《全书》内容颇为关心,对字迹勘校亦严加督责。他旨令“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因而馆臣对于需呈交“御览”的《荟要》及全套《全书》,自不敢有丝毫怠慢。其中仅校对一项,就安排有誉录、分校、复校、总校、总校抽查等诸多步骤,同时“各设功过簿二本”,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条例。其中规定:誉录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分校未看出誉录之错,一同记过;武英殿抽查发现错字,分校、复校等均同与誉录记过。若进呈后由皇帝指出,则各人记

过加倍。作为总校,陆费墀除校改誉录、分校、复校各环节遗漏的讹误外,还要对全书款式、卷篇、次序等进行把关。乾隆四十年年底撤撤复校,改由分校互校,总校的责任进一步加重。

陆费墀不仅以武英殿提调之职掌管底本收发,以总校之职统领缮录的校勘校对,还要预估定本抄写时可能出现的“俗体字”、避讳字、形近字等问题。为此他编写了《辨正通俗文字》一书,分辨似、正讹、正帖通用三篇,详细辨别文字的正、通、俗三体。书成后,誉录人员“倚为司南”,成为四库馆中的必备工具书。陆费墀又编撰《历代帝王庙谥年谱》《经典同文》等著作,“用便检省”,以减少因帝王避讳或字形相近而导致的讹误。可见强化校勘,减少书写错误,以免将来受到责罚,是陆费墀始终萦绕于心的重大问题。

受赔补身死家毁

陆费墀与于敏中的密切关系,既为其得以自始至终参与《全书》的编纂提供了契机,也为他最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四库馆开馆后仅一年,于敏中涉太監泄密案,逐渐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67岁的于敏中病逝家中。几年后乾隆帝下令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敬戒”。此期一直在四库馆全力修书的陆费墀,多次受到牵连。

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底本“短少”,弹劾陆费墀“办理毫无章程”。乾隆帝称陆费墀“专司提调,前后数年,事出一手”,其渎职之责不可推卸,同时斥陆费墀倚仗于敏中,“假藉声势”。乾隆帝将陆费墀先行撤职,降阶降官,此时距于敏中去世不过数月。但经过反复盘查,发现短少底本不过30余种,远不及王杰指控的四五百种。且底本短少主要缘于

人员混杂,“收发不清”,并非陆费墀一人之错。乾隆帝见此将陆费墀官复原职,令其继续编纂,但认为陆费墀仗势“牟利”的偏见,却没有太大改变。

这一隐患,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乾隆四十六年底,首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随即下令再抄六部,分藏于盛京、承德、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镇江、杭州等地,以昭“藏书丰富、教思无穷之盛哉”。《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誉录人员参差不齐,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上呈“御览”的《荟要》及文渊阁《全书》定本,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不过分校“北三阁”“南三阁”藏本时,“大功告成”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捷于蔽事”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因而抄本错误增多,在所难免。

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清代《四库全书》等官修书籍,“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可谓切中要害。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乾隆帝偶然在承德避暑山庄翻检文津阁收藏的《四库全书》版本,发现其中“讹谬甚多”。他下令复查,设法挖补改换。但随后又发现书中有“未经删削”等更为严重的错误。乾隆帝大为恼怒,认为“实属草率已极”,谕令对七阁《四库全书》全部重加校勘、抽改,并下令由原任总裁、总纂、总校各职的纪昀、陆锡熊、陆费墀等人分别负责。陆费墀因修书而致身死家毁的人生噩运,随之降临。

在四库修书的“三大员”当中,独以陆费墀所受责罚最为严重。乾隆帝在谕旨中对陆费墀大加斥责,称其屡邀恩赏,而所编之书“竟舛谬丛生,应删不删,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

篇累页。荒唐若此,该员所司何事”。乾隆帝严令其赔偿江南三阁全书装原积,令其继续编纂,但认为陆费墀仗势“牟利”的偏见,却没有太大改变。这一隐患,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乾隆四十六年底,首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随即下令再抄六部,分藏于盛京、承德、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镇江、杭州等地,以昭“藏书丰富、教思无穷之盛哉”。《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誉录人员参差不齐,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上呈“御览”的《荟要》及文渊阁《全书》定本,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不过分校“北三阁”“南三阁”藏本时,“大功告成”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捷于蔽事”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因而抄本错误增多,在所难免。

此后数年间,悲愤交加的陆费墀往来于江浙二省,奔波劳累,最终抑郁去世。但乾隆帝仍未释怀,称陆费墀:“所办三阁‘南三阁’藏本时,‘大功告成’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捷于蔽事’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因而抄本错误增多,在所难免。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清代《四库全书》等官修书籍,‘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可谓切中要害。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

事实上,自乾隆三十八年开馆时起,直至乾隆五十五年去世为止,陆费墀在修书的十多年间,每天自晨时(早晨7:00-9:00)入官,晚上自酉时(下午5:00-7:00)方出,“寒暑未尝稍懈”,成为四库馆中“实际任事最力”之人。作为专司修书的“三大员”之一,陆费墀可以说是“成也《四库全书》,罪也《四库全书》”。其后裔,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以高祖曾出任《四库全书》总校而引为家族骄傲,称“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乘,辄心向往之”。陆费墀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做出的独特贡献,理应得到后人更多的称赞与认可。郑永华



纪昀、陆费墀等署名的《四库全书》书影。